



子藏工程

诸子研究丛书

庄子逍遥义演变研究

叶蓓卿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庄子逍遥义演变研究 / 叶蓓卿著.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1.7 (诸子研究丛书)

ISBN 978-7-5077-3768-4

I. ①庄… II. ①叶… III. ①庄周(前369~前286)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22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0160号

责任编辑: 战葆红

封面设计: 徐道会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880×1230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0.00元

学术顾问

(依姓氏笔划为序)

李学勤 陈鼓应 陆永品
饶宗颐 卿希泰 傅璇琮

总序

春秋战国时期，王官失守，学术下倾，师徒授受蔚成风气，个人著述随之云涌而出。相较于《诗》、《书》、《礼》、《乐》、《易》诸经，私人著述思想自由，内容丰富，体式多样。老聃清静无为而作《道德》，庄周幻梦逍遥而作《庄子》，墨翟兼爱、尚同而作《墨子》，孟轲称美性善而作《孟子》，荀卿看透性恶而作《荀子》，邹衍广猎怪谈而作《邹子》，韩非痴迷法治而作《韩子》。此皆当时著述之英华，学海之太液，载万世而流芳。西汉刘向、刘歆父子董理群书而为《别录》、《七略》，单列“诸子”一类；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效仿刘氏，揽括诸子群英，归为九流十家。至是，子学有名，诸家定称。刘勰《文心雕龙·诸子》曰：“诸子者，人道见志之书。”纪昀《四库总目提要·子部总叙》云：“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子书立说见志，实为中华文化之源头活水。

然两千五百余年来，诸子之学或盛或衰，各个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态势。战国之际诸子活力劲健，生机勃勃，《庄子·天下》列百家之学，《荀子·非十二子》论十二家之失。两文虽语含刺讥，亦足以窥见春秋战国子学花烂映发、自由挥洒之盛貌。吕氏不韦，招抚宾客，结连辩士，揉合诸说，混成一统，故“循其理，平其私”（《吕氏春秋·序意》），实暗启子学衰败之势。秦皇暴政，黜文任法；汉武帝尊儒，排斥众议。此间虽有淮南作《鸿烈》，欲“统天下，理万物”（《淮

南子·要略》),备帝王之道,然争鸣之风已逝,子学气韵式微。汉元、成以降,扬雄《法言》、《太玄》,王充《论衡》,勇抒独见,略溢芬芳。更至东汉,经学失宠,诸子容光再闪。而王符《潜夫》,荀悦《申鉴》,虽踵武前修,亦时有创见。

魏晋乱世,士人惮祸,慕玄风而尚清谈,以期全生保真。何晏、王弼、郭象诠释《老》、《庄》,新意迭起;葛洪著《抱朴子》内外篇,屡多创获。然斯风独盛,诸家皆成附庸矣。而自南北悬隔,文辞鼓荡,吟赏之心渐炽,百家之气日衰。惟梁元帝《金楼子》、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无名氏《刘子》,隋王通《文中子》,稍拾余芬,聊慰人心。

李唐开科举而振世象,奉佛老而推贝典丹书,韩、柳又述儒家之道统。士人桎梏,难觅振聩发聩之音,诸子之学欲有所推深,不亦难乎!宋哲宗元祐中,吕公著上书请禁:“主司不得出题老庄书,举子不得以申韩佛书为学。”明神宗万历间,李廷机以子书盛行,不利孔孟之道,上疏请求禁止。二子之行,实以政治强压,而子学积衰,难挽濒弱之势。然自明中叶以后,王阳明、杨慎、朱得之、罗汝芳、焦竑、杨起元诸人,重以老庄佛道推盛心学,子学亦随之渐张。明末傅山倡导“经子不分”,曰“有子而后有作经者也”(《杂记三》),且身体力行,评注《老》、《庄》、《墨》、《荀》、《淮南》等,开近代诸子研究之先声。

有清一代,文字惹祸,屡见不鲜。较之前朝,士人更不敢放言高论,遂孔堆故纸,提倡朴学,集中对周秦汉魏残缺子书加以考订辑校,补苴修葺。其保存子书,复兴子学之功,可谓至高至伟。子学至此别开生面,遂有复兴之势。及入近世,政体更制,禁网松弛,加之西学冲击,学者奋智,瞩目诸子之书,子学于是彬彬复盛。钱穆、刘文典、冯友兰、于省吾、严灵峰、王叔岷、陈奇猷诸君,皆是子书考究与子学推深之能手,其他学者的文章著作亦不可胜数,且有以兼爱附平等,以孔学效耶教,以《淮南》列电力,子学已与西学渐趋融合。

今恭逢国家富强，文运昭回，为子书整理与子学繁荣复兴提供了极佳机遇。且地下文献沉藏千年而陆续出土，其中多有重要子书，为学者弘扬子学贡献了新资料，亦提出了新问题，创造了新空间。子学之复兴，其在今日乎？

子学之复兴，当以文献搜集整理为先。《四库全书》子部收书 930 余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共收书 1250 余种，《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收书 1640 余种。虽称浩博，实为庞杂。譬如《四库全书》子部，“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四库总目提要·子部总叙》），此乃“经史子集”之子，为图书分类之学，非“诸子百家”之子，已失立说见志之意。且一子只收一种或数种，名家著述、珍希善本、手稿札记，所遗尚多，难副“全书”之名，实为憾事。有鉴于此，为响应国家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倡议，充分发挥传统子学在现代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华东师范大学决定由先秦诸子研究中心领衔，整合各方资源，启动《子藏》超大型子学图书编纂工程。

《子藏》编纂将分两步展开：第一步，搜集自周秦至民国末期所有海内外存世和出土的诸子学之著作，择取最佳版本予以影印；第二步，为每一种子学著作撰写提要。预计完成后的《子藏》，可涵盖《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管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 50 余个系列，约 5000 种著述。如今，《子藏》工程已正式启动，将陆续影印发行。吾人相信，《子藏》必将成为一座宏大的传世经典文库，为海内外学者的子学研究提供扎实的文献基础，从而进一步传播和阐发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

子学之复兴，不仅仅在于文献资料的建设，更包括子学研究的深入拓展。作为有一定影响的诸子学研究机构，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

研究中心以全面复兴子学为己任，于2007年创办了国内外第一份专业的大型诸子研究刊物——《诸子学刊》，现已连续出版五辑，在中外学界颇有影响。现又决定有计划地出版《诸子研究丛书》，以此作为《子藏》工程之一部分，提升《子藏》的学术品位，使之成为资料库建设和学术理论研究相结合的精品工程。

该丛书海纳百川，包容并蓄，凡与子学有关之论著均在欢迎、吸纳之列。或总论子学之概要，或分论一家之特点；或专论一书，钩玄提要；或独论一题，探隐发微。凡斯种种，论内容：或学派，或专书，或专题，或作家，不拘一格；论方法：或考据，或义理，或阐释，或中或西，百花齐放。凡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有创造，有突破，自成一家之言者，均可入选。

《子藏》之编纂，为子学研究提供完备丰富的资料库；《诸子学刊》之编辑，为子学研究搭建了交流平台，提供了前沿信息；而今《诸子研究丛书》正式启动，出版有关子学研究之专门著作，又必将推动子学研究朝纵深方向发展。“三驾马车”，或资料，或论文，或专著，齐头并进，已然构成了子学研究的完整系统。

当仁不让，圣人之言；舍我其谁，亚圣之论。值此昌明之世，学术转型之际，我辈同仁当竭尽心智，戮力古学，留意百家，复兴子学，章华夏文明之本，延绵中华数千年优秀文化之传统！

古语云：“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趋。”（《汉书·吴王濞传》）得天下好子学之人，共襄复兴之盛事，岂不快哉！如此，子学全盛之日，可以预卜矣！

方勇

2011年8月18日

导 言

本书以庄子逍遥义的历史演变为研究对象，首先是因为《逍遥游》篇在《庄子》一书中的重要地位。作为全书开宗明义之作，《逍遥游》篇常被誉为“内篇之冠”（林云铭《庄子因》）、“全书之纲”（陆树芝《庄子雪》）。清人孙嘉淦认为：“《逍遥游》者，庄子之志也。……《齐物论》之丧我，《养生主》之缘督，《人间世》之无用，《德充符》之忘形，《大宗师》之入于天一，《应帝王》之游于无有，皆本诸此，实全书之纲领，故首发之，所谓部如一篇，颠之倒之而不可者也。”（孙嘉淦《南华通》）近人胡朴安也说：“此篇为第一篇，统括全书之意，逍遥物外，任心而游，而虚无、寂静、自然、无为之旨，随在可见。能了解此意，《庄子》全书即可了解。”（胡朴安《庄子章义·逍遥游》总论）可见《逍遥游》不仅是《庄子》全书的提纲挈领之作，同时也是人们理解庄子奥义的关键所在。

其次，《逍遥游》篇超凡脱俗的思想境界，奇幻莫测的开放式结构，寓言、重言、卮言交替并出的语言风格，使其成为了庄学史上一座歧路迭出却又极具魅力的九曲迷宫，吸引了众多解读者纷至沓来，探寻逍遥真义。一方面，历朝文士对于庄子逍遥义的各色阐释乃至争议，为我们留下了诸多宝贵的庄学研究资料；但另一方面，这些各自为政的解说也对人们深入理解庄子逍遥本义造成了一定的干扰。对此，清人胡文英指出：“善读者要须拨开枝叶，方见本根。”（胡文英《庄子独见·逍遥游》总评）事实上却又谈何容易！《逍遥游》篇美则美矣，却往往令人难辨真元。历来有多少翰林学士、文人骚客，乃至道教、佛教领域内的方士高

僧，都为其中的迷离曲折所困，近之不得，远之又不甘，最后则常常如同《逍遥游》篇原文中的斥鷃一般，自以为至，而离逍遥真谛却愈发遥远。

唐代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评价庄子其人其书，谓其“宏才命世，辞趣华深，正言若反，故莫能畅其弘致。”逍遥义阐释史上所出现的各类异象纷纭的解说，即可谓是对此处“莫能畅其弘致”一语的真实注解。秦汉两世，庄子学尚处于萌芽阶段，因而少有针对庄子逍遥义的专论。及至魏晋时期玄风大畅，庄子逍遥义竟一跃成为名士清谈的重要话题。据《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而且，支遁还与王羲之“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而《世说》该条刘孝标注引《支法师传》又说：“法师研十地，则知顿悟于七住；寻庄周，则辩圣人之逍遥。当时名胜，咸味其音旨。”可见逍遥义俨然已是魏晋名士僧人的核心议题之一。其中，司马彪认为：“逍遥无为者，能游大道也。”（《文选·秋兴赋》李善注引）是以“无为”为逍遥。向秀、郭象则认为：“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郭象《庄子注》）是以“适性”为逍遥。而支遁则引佛教般若性空之学为说，“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提出以“明至人之心”为逍遥的新说，认为要达到逍遥境界，必须“物物而不物于物”，而不是像郭象所说的各适其性、得其所待便能“逍遥一也”（《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支遁《逍遥论》）。仅以此三家异说为例，就可见出当时人们为何要以解读逍遥义为“难处”而竞相“钻味”了。

隋唐庄子学虽然在阐释《逍遥游》篇义理方面并无大的建树，仅有陆德明以“闲放不拘，怡适自得”为逍遥（《经典释文

·庄子音义》)，成玄英以郭象的“适性逍遥”说为基础所提出的以“所造皆适”（《庄子疏》）为逍遥等说法。表现较为突出的当属唐代文人，他们在创作诗文时，形成了一种以大鹏形象为逍遥的创作风潮，并以李白的《大鹏赋》为此观念的巅峰之作，从而弥补了唐代庄子学的平淡无奇。

其后，以王雱、吕惠卿等为代表的宋代庄子学，则主要倾向于一种以易学阴阳象数理论来解读《逍遥游》篇的风气，譬如他们多将《逍遥游》篇中的“九万”、“六月”，分别按照易学思想解释为极阴、极阳之数，认为鲲化为鹏以及大鹏南徙，都是阴阳互化的反应。而宋末的罗勉道与林希逸则各执一义，推翻本朝以《易》解《庄》的牵强做法。林希逸认为：“逍遥，言优游自在也。”（林希逸《庄子口义》）他以《论语》、《诗经》中的“乐”字，来比拟庄子的逍遥义，认为庄子的“优游自在”其实就相当于宋代理学家观念中的“孔颜乐处”。这样看来，林希逸虽然指正了宋代文士以《易》解《庄》风潮中的缺陷，但他自己也难免因为以儒解庄而偏离了庄子的逍遥本义。罗勉道则执一“化”字以释逍遥，认为“神游寥廓，无所拘碍，是谓逍遥游。”（罗勉道《南华真经循本》）并将逍遥游境界分为优等逍遥游和劣等逍遥游，进而提出以“至人无己”为第一等的逍遥游。

宋代以后，元明两季的庄学发展长期未能取得突破。明末清初，在易学方面多有造诣的明遗民方以智继承了宋人以易解庄的传统，并结合自身家传师学，以“象数取证”的方法，对庄子逍遥义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释与辨析。此后，吴峻则连通《连山》、《归藏》、《周易》三易，以释逍遥义。他的《逍遥游解》“无一字一句非释《易》也”（沈樸真《庄子解跋》），其以《易》释《逍遥》的热情，恐怕无人可及，但其中难免存有偏颇之处。藏云山房主人则以《老》为宗、以《易》为助，以释逍遥，并得出“无害无苦，真逍遥也”的结论。

明清时期的其他庄子学著作，则在吸收前人各种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以‘大’为纲”阐释庄子逍遥义的风气。如明

代陆西星认为：“人必大其心，而后可入道，故内篇首以《逍遥游》。”（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憨山和尚释德清也说：“逍遥者，广大自在之意。”（释德清《庄子内篇注》）时至明末，则由吴默正式提出《逍遥游》篇“以‘大’为纲”的观念（郭良翰《南华经荟解》引）。而清代庄子学便是在吴默“以‘大’为纲”说的基础上，对庄子逍遥义进行了新一轮的阐释。其中，林云铭、宣颖、胡文英、刘凤苞等直接继承前朝“以‘大’为纲”的逍遥义解法，从文章评点的角度对《逍遥游》篇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剖析；而另一边，吴世尚、林仲懿、孙嘉淦、梅冲等，则从理学中吸取“孔颜乐处”、“鸢飞鱼跃”、“活泼泼地”、“曾点气象”等思想元素，对逍遥义之“大”展开了儒学化的解说。

清初，林云铭在其《庄子因·逍遥游》题解中指出：“‘大’字是一篇之纲。”并在之后的《逍遥游》总评中再一次强调：“通篇以‘大’字作眼。”而对于何为“逍遥”，林云铭则以篇中“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一句为本，指出“至人无己”是“无待于己之所有”，“神人无功”是“无待于功之所及”，“圣人无名”是“无待于名之所归”，最终得出以“无待”为逍遥的结论。应当说，林云铭所阐释的逍遥义还是十分接近庄子逍遥本义的，只是他在阐释过程中因为过于强调“大”的观念，因而认为大鹏也是逍遥的，这就未免有些偏离了“无待逍遥”的精神。

康熙末年，宣颖也在自己的《南华经解》中极力称赞了《逍遥游》篇的大鹏之“大”，并认为大鹏与“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一样，都达到了逍遥游的境界。从这一点来看，宣颖所阐释的逍遥义实在与之前林云铭所阐释的逍遥义一样，都留下了小小的遗憾。当然，作为一名庄子文章学大家，宣颖不可能不受到各类文学作品以及前人解庄著作的影响，而他之所以认为大鹏是逍遥的，也就情有可原了。宣颖在解读《逍遥游》篇鲲鹏寓言时曾写道：“大鹏之所以横绝南北，直具如此源委。夫脱髻鬣于海岛，张羽毛于天门，乘长风而薄霄汉，扩云雾而煽太清，斯其超忽，岂复恒境也哉！”此情此景，几乎就像是李

白那篇极富盛名的《大鹏赋》的微缩版写照。而对于宋末罗勉道的“优劣势逍遥”说，宣颖也是有所承继的。我们知道，罗勉道在《南华真经循本》中，曾将逍遥游分为优等逍遥游和劣等逍遥游，并将“至人无己”单独列出，认为至人在整篇《逍遥游》中是代表了最优等的逍遥境界。而宣颖在其《南华经解》中则进一步发展了罗勉道的这种观点，指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三句之中，“‘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都是陪客”，又说“逍遥游一篇文字，只是‘至人无己’一句文字。‘至人无己’一句，是有道人第一境界也。”所以“学道之人，便要学至人之事。”（宣颖《南华经解·逍遥游》题解）不过，宣颖在阐释庄子逍遥义的时候，虽然极为重视“至人无己”一句，但由于他所持有的儒学化的阐释倾向，因而常会以孔子的“克己”来比拟庄子的“至人无己”，又以颜回的安贫乐道来比拟一种“忘我”的状态，甚至将“孔子之绝四也，颜子之乐也，孟子之浩然也，庄子之逍遥游也”，并称为同一种“心学”。这种以入世的儒家心性之学强行比对应世的庄子逍遥义的做法，对于超尘脱俗的庄子而言，难免有歪曲之嫌。

与宣颖同时代的吴世尚，则“以‘大’字作线索”，并将《逍遥游》篇与宋代理学家所热衷的“鸢飞鱼跃”、“活泼泼地”等观念进行对照，从而将庄子逍遥义阐释为宋儒所谓“活泼泼地”。吴世尚认为，《逍遥游》篇正反映了“道之活泼泼”、“心之活泼泼”，以至于“天地之间无一而不活泼泼也”。文中的鲲鹏之“大”，即象征着“道大、心大、世界大也”，而蜩、鸠、斥鴳则为“小”的象征。下半篇分论部分，“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以及宋荣子、列子等，也都是“小”的代表，真正能够体现道大、心大的，“其唯至人、神人、圣人已乎”。因此，在现实之内，只有“德已极而不自知其极，治已至而不自以为至”的尧，才称得上是“古今之一最大者”；而在尘世之外，则要数“其德无己”、“其化无名”，又能“旁礴万物，陶铸尧舜”的藐姑射神人，为“天地间之又一最大者也”。吴世

尚甚至还受到苏轼关于庄子对孔子“阳挤阴助说”的影响，将孔子也看作是逍遥游的“最大者”，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庄子“无待逍遥”的本义。

雍乾之际，林仲懿在其《南华本义》中以“大”字为“立言主意”，以“无”字统领全篇精神，并多番引用《中庸》、《论语》等儒家经典以及周敦颐、朱熹、二程等的理学思想，认为庄子所称道的“江湖大樽、广莫大树，或未必不在沂水舞雩之班”，但是“说到结穴，只是脱尽俗情、不撓世患而止，与孔颜之乐固自异趣。”甚至认为：“得其本义，而庄子与吾儒冰炭益明已。”（《南华本义·凡例》）应当说，林仲懿对于庄学与儒学之间的差别对立还是有所察觉的，对于庄子逍遥义的总体把握也具有一定的准确度，尤其他在解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时，还难能可贵地得出了“无待为大”这一比较接近庄子“无待逍遥”本义的结论，这就更值得后世学者借鉴了。

与林仲懿同时代的孙嘉淦，则在其《南华通》中秉持着“惟无乃能大”、惟大乃能逍遥的宗旨，通过对文中“小者困苦，大者逍遥”的两两对比，多方引用儒家经典、理学思想，最终得出了以“至人无己”为“大之至矣”的结论。应当说，孙嘉淦的阐述在普遍以“大”为逍遥的清代庄学界仍具有一定特色，尤其是他引入理学家关于“理一分殊”的观念，从“实体存在”与“观念存在”两个角度来评析庄子的“至人无己”，实可谓别开生面。不过与大部分以儒解庄的治庄学者一样，孙嘉淦在阐释原文过程中，也误将有待于扶摇之风的大鹏视作达到了“无己逍遥”境界的代表，这就未免偏离了庄子“无待逍遥”的本义。

继吴世尚、林仲懿、孙嘉淦之后，梅冲在其《庄子本义》中，又大量引用《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并以“圣人之道”为大，以藐姑射神人为“大之极”者，还将孔子视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所指对象，认为《逍遥游》篇旨在揭示“君子以至德凝至道，必归于足以兴，足以容，明哲保身，盖所谓独善其身者，必启手启足，全受全归，毫发无

憾，乃为完其性分之事。知古圣贤战战兢兢之中，自具器器荡荡之乐”的“圣学之指归”。如此一来，就彻头彻尾地将庄子的“无待逍遥”改造成了儒家“孔颜乐处”式的“得道者之乐”。而明清两代以儒学思想阐释庄子逍遥义的风潮，也在梅冲不遗余力的发挥之下，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顶峰。

乾隆年间，胡文英则上承林云铭、宣颖等“以‘大’为纲”的评点派作风，也在其《庄子独见》中执“大”字以释逍遥。胡文英在鲲鹏寓言中，紧扣着大鹏之“大”，于细微处发掘出庄子用心，并得出了“无所待，故得逍遥”的结论，实可谓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而这种“以‘大’为纲”阐释庄子逍遥义的作派，也一直延续到了清朝末年。庄子文章学方面的集大成者刘凤苞和他的前辈人一样，在其《南华雪心编》中主张“‘大’字，一篇主脑”，并以此“大”字为“通篇眼目”。刘凤苞将《逍遥游》篇分为三个“大”阶段：一是鲲鹏的“大则能化”，二是至人、神人、圣人的“大知本领，变化无穷”，第三则是大瓠、大樗的“大而无用，而能以无用为有用”，并围绕此“三大”来展开对于庄子逍遥义的阐释。在鲲鹏寓言中，刘凤苞指出，大鹏与野马、尘埃一样，对生物之息“皆有所待”，所以尽管“大”，却仍然称不上是逍遥的。在清代“以‘大’为纲”阐释《逍遥游》篇的风气中，刘凤苞虽然从文章学的角度也赞同以“大”字为“通篇眼目”，但在具体进行义理分析的时候，他仍然坚持认为大鹏是有所待而不逍遥的，应该说，这份清醒是十分难得的。而刘凤苞在对“至人无己”的看法上，则与罗勉道、宣颖等一脉相承，同样认为“至人无己”才是压倒一切的逍遥境界。对于《逍遥游》篇原文中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一语，刘凤苞明确提出“神、圣在至人之下”的看法，认为“神、圣之称，以无功、无名为极则，而使人共见为神、圣，不若至人之相忘于无己也。故神、圣在至人之下。无己，而功名不足言已。”（刘凤苞《南华雪心编》）这就为清代庄学界“以‘大’为纲”阐释庄子逍遥义画上了一个较为圆满的句号。

庄子逍遥义经由明清两代“以‘大’为纲”的阐释，到了清末民初时期则渐渐回归于“无待逍遥”的本义。王先谦在其《庄子集解》中就明确提出：“无所待而游于无穷，方是《逍遥游》一篇纲要。”林纾也在其《庄子浅说》中指出：“不能到于无所待而悠然自行地步，犹未极逍遥之趣。”而近人王叔岷则在其《庄子校诂·逍遥游》题解中指出：“心意自得，则无待于外，惟无所待者，乃能无往而不逍遥。《逍遥游》篇下文云：‘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即本篇主旨所在。”虽然他们在大鹏是否“有所待”的问题上还与庄子本意时有违背，但在“无待逍遥”的旨趣上确实已经返本归元，重新回到了庄子的逍遥本义上。

现代学者对于庄子逍遥义也多有阐释。陈鼓应先生在其《〈逍遥游〉：开放心灵与价值重估》一文中指出：“《逍遥游》是以描述一种透脱的心境——一种优游自在、徜徉自适的心境。本篇描绘着一个自由飞翔的开放心灵，呈现出一种博大无碍而与物冥合的精神境界。”（陈鼓应《老庄新论》）很明显，陈先生此文是以《逍遥游》篇的大鹏为“游于至大之域”的逍遥游典范，认为庄子写作《逍遥游》篇的目的，就是为了提供给世人“一个广阔无边的心灵世界”、“一个辽阔无比的精神空间”。由此看来，陈鼓应先生所赞同的应当还是明清两代以“大”为纲的逍遥义，而其源流则可上溯于晋唐诗文中以“大鹏”为逍遥的创作指向。对此，崔大华先生则认为：“庄子是以是否实现无任何负累的自由（‘逍遥’）来划分人生境界的。在庄子看来，只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恶乎待’（无待）者使自由的；其他虽有情境的差别，但皆是不自由的‘犹有所待’者，这实际上也就是认为只存在‘圣人’（‘至人’、‘神人’、‘圣人’）和‘众人’两种精神境界。”（崔大华《庄学研究》）应当说，崔先生的论述还是十分契合庄子无待逍遥的本义的，而其“无任何负累的自由”一说，也让我们不由想到宋代王雱、吕惠卿等的“无累逍遥”说。另外，刘笑敢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中曾指出：“逍遥游

的主体是心灵，所游之处是幻想中的无何有之乡。逍遥游的实质即思想在心灵的无穷环宇中遨游飞翔。”（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这也从一个侧面强调了庄子逍遥义的精神本质。从上述几位学者的论述中还可以发现，庄子的“逍遥游”在现代学者观念中已逐渐为“自由”一词所替代。

由此看来，历代学者对于庄子逍遥义都极为重视。但翻检历年著作与论文，至今未有学者对逍遥义的历史演变进行过系统的爬梳与论证，即使偶有涉及也多半集中在辨析逍遥本义上，对其演变脉络则分析得不够透彻，所涉及的庄子学著作也不够全面。如贾宗普《论前人对庄子“逍遥”的不同阐释》^①，是从“适性”、“空无”、“自在快适”三个角度来论述郭象、林希逸、成玄英、王雱、陆西星等所阐释的庄子逍遥义，但对于清代庄子学著作及其“以‘大’为纲”释逍遥的内容却无所涉猎，而其“适性”、“自在快适”两节内涵，区别也并不明显。又如刘笑敢先生《从超越逍遥到足性逍遥之转化——兼论郭象〈庄子注〉之诠释方法》^②，虽然论述清晰，概念融通，但毕竟限于郭象《庄子注》一家，而未能对整个逍遥义演变史进行宏观把握。同样，韩国良的《即色与逍遥——支道林哲学思想初探》^③也主要是论述支道林《逍遥论》及佛学思想，未能论及逍遥义前后发展脉络。而宗明华、索燕华《庄子“逍遥游”在魏晋文学中的嬗变》^④则是以庄子的逍遥游思想来观照阮籍、嵇康、陶渊明等魏晋文人的诗文，并没有反过来对庄子逍遥义进行深入阐释。张瑞君《超越有限的图腾——论李白〈大鹏赋〉与庄子〈逍遥游〉的继承关系》^⑤、何念龙《大鹏：从哲学意象到文学自我——庄子、李白文化符号类

①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② 《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3期。

③ 《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

④ 《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⑤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